

张文雄
胡锦涛
叶君
主编

1935—1949

九十年革命，筚路蓝缕，前仆后继，开先人未有之业
五千年文明，辟地开天，推陈出新

问鼎天下

刘华清 著



東方出版社

张文雄
胡锦昌
叶君
主编

问鼎天下

1935—1949

刘华清 著



東方出版社

策 划：王德树
责任编辑：鲁艳芳
封面设计：万有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鼎天下：1935~1949 / 刘华清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聚焦主席台 / 张文雄，胡锦涛，叶健君主编)
ISBN 978-7-5060-4105-8

I. ①问…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1935~1949—通俗读物
IV. ①D23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2363 号

问鼎天下 (1935—1949)

WENDING TIANXIA (1935—1949)

刘华清 著

张文雄 胡锦涛 叶健君 主编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字 数：313 千字

印 张：19.25

书 号：ISBN 978-7-5060-4105-8

定 价：42.00 元

前 言

90年前，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20世纪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她的成立给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之火，给历尽苦难的中国人民点燃了希望之灯。90年后，我们适逢建党九十周年盛事，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创造的辉煌和灿烂成就惊叹不已。

从1921年到现在，我们党走过了艰难曲折而又辉煌灿烂的历程。在挫折中经受考验、在困难中探索前行、在奋斗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已从幼年时期仅有五十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到今天拥有七千八百多万党员并执政六十多年的大党、成熟的党。在风雨磨难中，在艰辛建设中，在改革大潮中，我们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引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向前发展的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正是由于领袖的导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航船虽历经惊涛骇浪却能始终奋勇向前，中国革命事业虽多次濒于绝境却能转危为安，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才能在内有敌特破坏、外有帝国主义封锁、经济百孔千疮、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得以迅速稳固、发展，并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迎来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经过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保持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我们党近九十年艰辛探索和历史经验的集中概括，是对我们党近九十年不懈奋斗历程的精辟总结。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兴旺发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奉献，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巨大推动力和创造力，同样，也离不开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作用。他们是引路人，离开了正确的引导，人民群众难免迷失方向；他们是组织者，离开了坚强的组织，人民群众凝聚力难以有效形成；他们是决策者，离开了科学的决策，人民群众的行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们是先锋队，离开榜样的示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难以充分调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史，既是一部人民群众的创造史，也是一部领袖人物的活动史。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在一个政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中，革命队伍中难免有矛盾，难免有经不起考验的堕落分子，难免有凭借不正当手段登台表演的丑角。但他们不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只是匆匆过客，并最终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唾弃。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公正回答，也是历史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聚焦主席台》丛书以中共中央先后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丰富的史料，客观地分析点评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这一历史时期，曾活跃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分析了这些代表人物走上成功之路的原因，剖析了个别人物失意甚至走向堕落的教训。通过透视领导者的活动，聚焦领导者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脉络，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的不懈追求和艰辛探索，深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领导规律的认识，进而能够更加坚定起我们对党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能够更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能够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目 录

第一章 非常时期	1
一、国不可一日无君，党不可一日无首。毛泽东说，张闻天负总责有三大好处	1
二、张国焘“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他当上了红军总政委	5
三、十万大军联合行动，少不了一个前线指挥部。谁来担任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想到了徐向前	10
四、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提出一个九人名单。为顾全大局，中央决定：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	14
五、“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支唱遍陕北高原的民歌讲述的就是刘志丹的传奇故事。刘志丹被任命为红都瓦窑堡的警备司令	21
第二章 边区政要	26
一、林伯渠是老同盟会员，又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成为国共双方认可的边区政府主席人选	26
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张国焘无事可做。善于投机钻营的他，抛出《我的错误》，换来一个副主席	29
三、备受毛泽东器重的高岗，当上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司令员，被毛泽东称为“保镖”	33

- 四、以爱提建议而著名的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成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41
- 五、雷经天曾经受过冤屈，因而最懂得公正的含义。他肩负着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重任 45

第三章 八路军精英 49

- 一、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主力队伍，它的最高指挥员必须是一个既有指挥才能又有崇高威望的人。于是，朱德走上了总指挥的岗位 49
- 二、“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的诗句是彭德怀生平事迹的真实写照，他成为八路军的副帅 55
- 三、叶剑英足智多谋，左权经验丰富，他们分别出任八路军正、副参谋长 60
- 四、红军时期在战场上赢得“常胜将军”的美名，被毛泽东称为“娃娃”的林彪，成为一一五师师长 68
- 五、“两把菜刀闹革命”曾使他威名远播，南昌起义的枪声更使他闻名遐迩。贺龙这位最具传奇色彩的将军成为一二〇师师长 72
- 六、“四川人说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毛泽东的信任让独眼将军刘伯承挑起了一二九师的大梁 78

第四章 新四军栋梁 85

- 一、新四军军长的人选，国民党指定的人共产党不会接受，而共产党提名的人蒋介石又不会轻易批准。于是，周恩来想到了叶挺 85
- 二、为了切实保证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中共派出自己的中央委员、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项英出任副军长 90
- 三、张云逸是百色起义的名将，袁国平则被毛泽东称为

“政治开展”的贤才，他们分别走上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岗位	95
四、在重建新四军的锣鼓声中，以《梅岭三章》唱响大江南北的陈毅临危受命，走马上任任代军长	101
五、为了表示重建新四军的信心和决心，中共中央将“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刘少奇安排到该军政治委员的岗位	112
第五章 谁主沉浮	122
一、王明这位从昆仑山下下来的“神仙”，成了书记处的重要人物	122
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收回了王明的“尚方宝剑”。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推选毛泽东为党的主席	127
三、张闻天坦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被称为“明君”的张闻天离开书记处，选择自己熟悉的宣传、教育工作	137
四、昔日中央负总责，如今成了党报司令。不计个人得失的博古胸怀坦荡地对同事们说：“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	145
第六章 胜利大会	150
一、七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是党的领导核心。毛、朱、刘、周、任当选为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	150
二、留在党内的中共一大代表仅余两人。正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董必武成为政治局的一名新成员	183
三、“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毛泽东这样一问，使得犯过路线错误的王明、李立三得以顺利进入中央委员会	190

- 四、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不见王稼祥的名字，毛泽东觉得对不住这位老朋友，赶忙对他进行一番宣传介绍。于是，王稼祥当上了候补中央委员 197

第七章 东北大员 206

- 一、对于一个地方的一把手来说，最需要的才干就是总揽全局。彭真既有白区工作的领导经历，又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东北局书记的理想人选 206
- 二、东北局担负着开拓新局面的重任。既重视人才，又懂得财经的陈云成为中央考虑的首批人选 213
- 三、李富春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全才”，他成为东北局的重要一员 219
- 四、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改变了林彪的赴任旅途。他成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224
- 五、东北部队来自五湖四海，部队团结是件大事。以善于做政治工作著称的罗荣桓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 232
- 六、林彪挥师南下，东北局属高岗地位最高。于是，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高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238

第八章 将帅明星 246

- 一、“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被邓小平称为“大军事家”的刘伯承挑起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的担子 246
- 二、他曾参加了具有建军标志的南昌起义，又是被毛泽东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当华北军区成立时，聂荣臻再次被中共中央点将 252
- 三、粟裕善于出奇谋，用奇兵，建奇功。毛泽东说：这个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1947年华东野战军组成时，他被任命为副司令员 260

四、无论在情报保卫工作的隐蔽战线，还是在硝烟弥漫的炮火中，陈赓都是功勋显赫的英雄。在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中，他成了陈谢兵团的主将	268
五、“我是一个军人，我的真正的专业是打仗。”已经拥有“总设计师”称号的邓小平仍然忘不了他担任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的经历	275
六、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中，中央军委作出统一编制的决定，四大野战军相继成立，彭、刘、陈、林分别成为各野战军的统帅	283
参考书目	295

第一章 非常时期

聚焦时间：1935年1月至12月

聚焦地点：从遵义到陕北的长征路上

聚焦人物：张闻天、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刘志丹

聚焦话题：张闻天当过“总书记”吗？张国焘反对北上为哪般？陈昌浩、周纯全为何进了中央政治局？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在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的长征路上，中共经过了长征以来更为艰难的时期。它既要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围剿，又要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作斗争。在这个非常时期，有众多人物在当时留下了身影……

一、国不可一日无君，党不可一日无首。毛泽东说，张闻天负总责有三大好处

遵义会议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央出现了主要负责人不能到位的情况。遵义会议只增加毛泽东为常委，并没有变换现有领导。博古由于在会上受到批评，不便再履行负总责的职务，但常委还没有具体分工，其他人也不便出面负责。好在当时战争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军事负责人已经确定。因此，大家对谁负总责的问题并不在意。

但这一情况到1935年2月初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时，留守在中央苏区的项英多次来电请示，要求中央作出指示。博古总是把电报揣在自己的口袋里，既不敢召集会议，也不敢独自回电。项英急了，在2月5日又以中

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关于苏区行动方案的两种意见，要求中央迅即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博古只好找到张闻天，告以实情。

这时，中央已经来到了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岔河一带。这里是滇黔河和渭河自然汇合形成的赤水河的交汇处，三河交汇形成了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交界点。在这里，“一鸡长鸣，三省皆闻”，故称“鸡鸣三省”。

2月5日，张闻天找毛泽东商议，认为博古在遵义会议受到大家批评后，思想上还有抵触情绪，恐怕难以再领导下去。毛泽东把张闻天的意见转告周恩来。周恩来表示赞同，同时提出由毛泽东出来领导比较合适。毛泽东表示自己不便负责，并提出由张闻天来做比较好。毛泽东列举了三点理由：他（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系统地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他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对团结一大批留苏回来的干部很有好处；共产国际对他也很信任，这样对共产国际也好交待。周恩来佩服毛泽东的深谋远虑。

当天晚上，政治局常委们就在这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开会进行分工。由于会前已交换了意见，会上没有多大争论，博古也很配合，会议最后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

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由张闻天负总责是比较合适的。

首先，他是从“左”倾错误路线中分离出来的人物，又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功臣，能够得到党内多数同志的支持。

张闻天，又名洛甫，上海南汇人，早年在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1920年至1922年，先后赴日本、美国学习和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苏联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后，便任中央宣传部长，负责编辑中央机关刊物。同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核心。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在随后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王明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张闻天曾是这一路线的积极追随者。1931年10月26日，他发表《满洲事变中各个派别中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一文，照搬斯大林的公式，把中间派别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提出要采取揭露、

打击的方针。在1932年4月发表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中，鼓吹“进攻”路线，号召“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同时，他还发表文章，说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是“等待主义”。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又参与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但是，张闻天绝不是那种思想僵化的人。到中央苏区后，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觉察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开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博古发生分歧。如在对待福建事变问题上，他不赞成博古不同十九路军配合的关门主义主张，而主张积极配合。广昌战役失败后，他对博古的这种不满发展到公开冲突。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回忆说：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诬蔑。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正是这种对“左”倾领导人的不满，促使他同毛泽东接近和合作。而在这时，博古开始从组织上进一步排挤他，如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他不得与闻，这也促使他尽快与“左”倾势力决裂。张闻天回忆说：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张闻天在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后，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政治局内积极地开展了同博古、李德机会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的胜利，便是他积极配合的结果。在遵义会议上，在博古的正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接着作了“反报告”，他按照事先与毛泽东商议的内容，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系统而又旗帜鲜明的批判。这是他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公开决裂的标志。他的“反报告”为会议否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毛泽东批判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阐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长篇发言，就是在这个“反报告”的基础上展开的。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起核心作用的当然是毛泽东，因为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央队“三人团”的旗手。但是，由于他已被剥夺了军权，事实上也被剥夺了党权（虽然在五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但不能参与领导工作），他的正确主张还得凭借他人的力量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如果没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站出来代表正确路线批判“左”倾军事路线，要想很快纠正错误路线是非常困难的。张闻天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在遵义会议上处于关键的地位。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是仅次于博古的第二号人物，具有别人不可比拟的职务优势。同时，他又是从“左”倾阵营中分裂出来的重要人物，他的转变，不仅可以壮大正确路线的阵营，而且可以动摇“左”倾派别势力的军心。可见，他在遵义会议中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关于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报告中特别指出：“遵义会议是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其次，张闻天的任职也是加强党内团结的需要。红军长征是一次极其艰难的战略大转移，既要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又要战胜来自自然界的极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高级干部之间的团结至关重要。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既和留苏回来的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保持一定的联系，又与毛泽东等在国内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友善，这时由他负总责更有利于全党的团结。而且，他已经是党内的二把手，由他接替博古，更加顺理成章，不至于引起大的波动。

再次，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容易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方针政策、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上得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职务变动，没有它的批准是不行的。张闻天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达五年之久，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过，为共产国际领导人所认识和了解，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而当时在声望和能力上最有资格任此职务的毛泽东则没有这个条件，那时共产国际对他还不了解，甚至还带有偏见，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曾几次来电要调他去学习。因此，从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来看，当时也只能做此安排。

此外，张闻天为人宽厚，平等待人，尊重他人意见，由他负总责，不会妨碍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总之，张闻天负总责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194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时“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二、张国焘“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他当上了红军总政委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过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前锋胜利会师。

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为壮大革命力量，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实现北上抗日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合作态度，而张国焘又是一位关键人物。为了争取张国焘的合作，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按照红军的体制，总政委也就是军委负总责者。为什么要给张国焘这么高的职务？这得考察一下张国焘的历史、为人以及当时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实力状况。

张国焘，长期在红四方面军中推行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实行个人独裁，红四方面军许多官兵都把他看成红四方面军的灵魂和核心，如果不给他一个有职有权的职位，会使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丧失信心，以为中央不信任他们。因此，从团结和争取红四方面军来说，必须对张国焘做出适当的安排。张国焘犯过严重错误，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譬如，在大革命时期，他执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产生动摇，南昌起义在酝酿时，他专程赴南昌阻止起义；在鄂豫皖苏区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时，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并主持开展错误的“大肃反”，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压制和打击，致使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不得不在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创建川陕根据地后，他又不向中央请示，于1935年4月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等等。但是，他又是一个有一定能力的人。他虽然不断丢弃根据地，但又不不断创造新的根据地，而且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两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已由他刚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时的不足一万人发展到八万多人，成为最大的一支主力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军会师时，正值红军遭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最需要干部的时候，给他一个合适的职务，从关心和爱护干部、发挥他的积极性和特长方面来说，也是必要的。

当然，做出这一安排，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张国焘是一个实力派，你不给他一个适当的位置，他就不会同你合作，红一、红四方面军也就走不到一块儿。还是看看张国焘自己的表现吧。

在没有掌握中央红军的实力以前，张国焘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还是相当尊重的。6月12日，他在茂县得到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报告后，当即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表示欢迎。6月15日，张国焘又与陈昌浩、徐向前一起以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名义发出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的贺电。

这时，中央和张国焘虽然也有关于北上和南下的不同意见，但都是用的商量的口气。然而，当张国焘了解中央红军的实力以后，他的态度便发生了截然的变化。

为了商决两军会师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6

月25日，张国焘在骑兵护卫下到达懋功以北的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冒雨站在路旁，欢迎他的到来。当天，召开了会师大会，朱德、张国焘先后讲话，气氛十分热烈。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提出为了迅速攻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与会者都赞成北上方针，张国焘也发言表示同意。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了北上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革军委于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确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根据目前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到赤化川陕甘之目的。计划规定，两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准备趁国民党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攻占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

为了给两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组织上的保证，在发布《松潘战役计划》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可是，张国焘的主要注意力似乎不在行动方向方面，而在红一方面军的实力上。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以后，他看到中央红军个个面黄肌瘦，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服，背的是五花八门的背包，便动起了心思，特意向周恩来询问起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自恃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人比中央红军多，装备比中央红军好，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起来。于是，他不再满足中央政治局常委给他中革军委副主席的任命，一再要求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

为了实现其权力野心，张国焘先是按兵不动，并致电中央重唱他的南下老调。同时进行一些暗中活动，譬如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给他们送东西，想收买中央红军的主要干部，挑拨党内的关系。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